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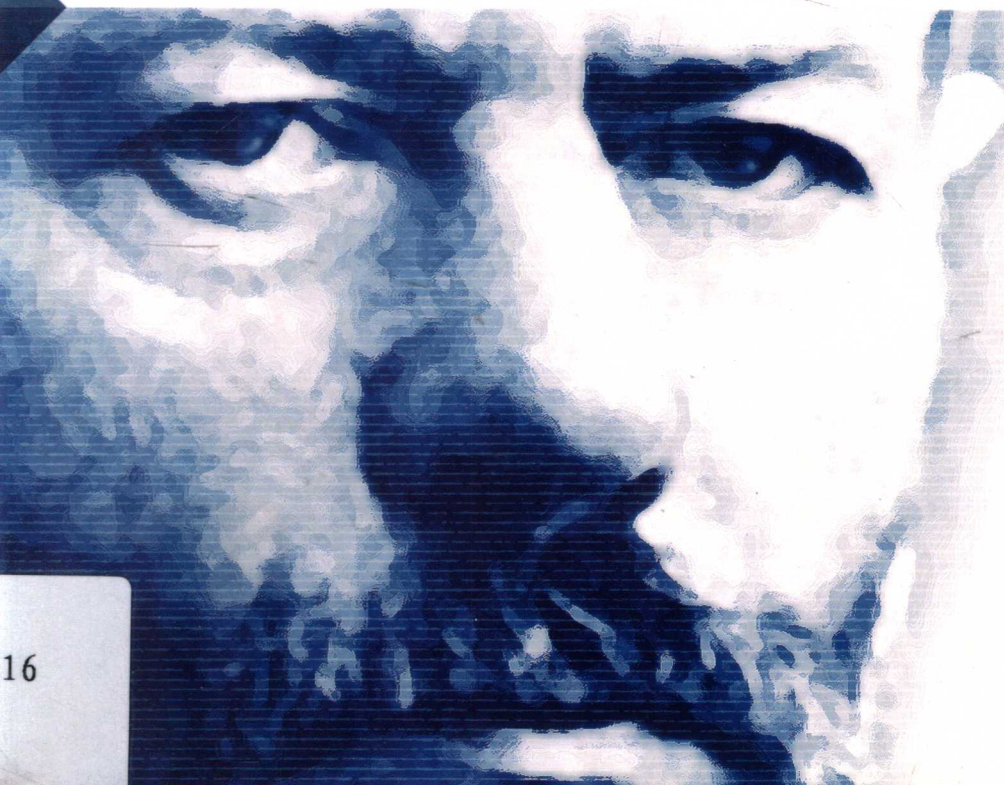
Wolfgang Schluchter 施路赫特 著

顧忠華/錢永祥 譯

超釋韋伯

◆ 理性化、官僚化與責任倫理 ◆

百年智慧



Wolfgang Schluchter 施路赫特 著

顧忠華/錢永祥 譯

超釋韋伯

◆ 理性化、官僚化與責任倫理 ◆

百年智慧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超釋韋伯百年智慧：理性化、官僚化與責任倫理 / 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著；顧忠華，錢永祥譯。-- 初版。

-- 臺北市：開學文化，民 102.05

面；公分

ISBN 978-986-89264-1-7(平裝)

1. 韋伯(Weber, Max, 1864-1920) 2. 學術思想 3. 社會學

540.2

102008766



Uni 004

超釋韋伯百年智慧：理性化、官僚化與責任倫理

作者：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5N608PA

譯者：顧忠華、錢永祥

責任編輯：施榮華

封面設計：斐類設計工作室

創辦人：顧忠華

發行人：蔡素貞

出版發行：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泉州街 9 號 3 樓

電話 (02) 2301-6364

傳真 (02) 2301-9641

讀者服務信箱：ireader@openlearning.com.tw

編經銷：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館前路 18 號 5 樓

網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話 (02) 2375-6688

傳真 (02) 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排版印刷：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 280 元

I S B N : 978-986-89264-1-7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内容者，須徵求開學文化同意或書面授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本書中文繁體譯文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暨允晨
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特此感謝！

本書引用之韋伯著作縮寫對照表

本書經常引用之韋伯著作，在註釋中以下列之縮寫字母代表。

WuG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d. J. Winckelmann, 第四版，Tübingen, 1956

ES =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G. Roth and C. Wittich; tans. E. Fischhoff et al. New York, 1968.

RS I, II, III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72 (RS I), 1972 (RS II), 1971 (RS III)

WL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 Winckelmann, 第二版，Tübingen, 1958

PE =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首刊於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後收入 RS I。

SS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1924。

SW =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24 °

PS =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1958 °

時序 2013 年，離開我還在唸博士學位時，翻譯了指導教授 W. Schluchter 的《理性化與官僚化》一書，悠悠過了 27 年，而 Schluchter 教授與我在台北異地重逢，兩人滔滔不絕地討論著韋伯，好似又回到了攻讀博士階段，充滿了熱情與活力。當下，我興起了重新出版指導教授譯作的念頭，於是我向他解釋，原來之前的出版社並沒有取得授權，在台灣的著作權法修正（1992）之後，即停止發行。不過，中國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卻在 2004 年出版了《理性化與官僚化》的簡體字版，這對於習慣閱讀繁體字的台灣讀者，不是很公平的。我當面向 Schluchter 教授請求同意授權，讓這本詮釋韋伯思想的力作，能夠重出江湖，帶給現代人進一步省思資本主義何去何從的機會。

Schluchter 教授聽到我的意見，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他曾經於 1986 年第一次訪問台灣，見到過《理性化與官僚化》剛剛出爐的版本，他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在台灣有一群「粉絲」，尤其當他參加「韋伯與中華文化：《儒教與道教》一百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竟然有好幾位與會學者，

拿著《理性化與官僚化》的譯本請作者簽名，讓他見識到詮釋韋伯的論著其實像老酒般「愈陳愈香」，這也更堅定了我委託開學文化出版社重印本書的信心。

實際上，除了《理性化與官僚化》中收錄的兩篇論文外，在允晨出版社最早編輯的《韋伯選集 I：學術與政治》中，也有一篇我與錢永祥教授合譯的〈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韋伯論學術與政治之關係〉（惟本書更改了「價值中立」的譯法為「價值自由」），經允晨出版社及錢永祥教授的同意，在此一併收錄於本書，益發可以讓讀者完整了解 Schluchter 教授對於韋伯思想體系的「超釋」（使用這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概念，甚至當作書名，主要只想突顯 Schluchter 教授「卓越地詮釋」韋伯的功力，靈感來自於《超譯尼采》，特此說明）。

本書所譯的三篇文章及附錄原皆出自於 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Frankfurt, 1980)。這本論文集共收六篇曾獨立發表的文章，乃作者十年中針對不同問題的論述作品。其中第一篇〈理性化的矛盾〉原發表於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5 (1976) pp. 256-284；第二篇〈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則於 1971 年以單行本出版，這兩篇且由 Guenter Roth 譯成英文，收在 W. Schluchter/G. Roth,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Berkeley, 1981) 一書中（本書此篇譯文主要根據此英譯版本）。第三篇〈官僚制與民主〉原是作者 *Aspekte bürokratischen Herrschaft* (München, 1972) 書中的一章，曾由 José V. Casanova 節

譯，刊在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 4. 1983, pp. 313-338)。

除了以上三篇外，第四篇〈權威式的資本主義——韋伯對德意志帝國的批評〉乃首次發表。第五篇〈國家與管理行為〉及第六篇〈醫學的合法性問題〉則是作者的時論性文章，與前四篇圍繞韋伯的討論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本書只收錄第一、二、三篇的中譯，除了分別將較長的註釋獨立為附錄一、二外，並以第四篇的註三十八做為附錄三〈韋伯著作的分期問題〉，此一選擇的理由必須向讀者作一交代。

如前所述，原書的六篇文章具有各自獨立的性質。即使前四篇皆集中討論韋伯的學術與政治思想，但亦各有其不同的重點。〈理性化的矛盾〉一文主要想替韋伯宗教社會學的論證理出一條清楚的脈絡；〈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旨在闡釋韋伯的兩篇演講稿〔學術作為志業〕及〔政治作為志業〕；〈官僚制與民主〉緊扣韋伯對官僚化趨勢的診斷，而以西方及中國的例子加以驗證。相對於前三篇，第四篇〈權威式的資本主義〉則集中探討韋伯對德國走向資本主義發展所遭遇之問題的看法。

就譯者而言，本書收錄前三篇文章，對本地的讀者可能較具有現實性及迫切性。一方面是「理性化」的概念眾說紛紜，Schluchter 教授提綱挈領地呈現了韋伯處理這個問題的主要線索，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官僚化」始終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主題，亦是他關切現代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思考重心。尤其韋伯將東西方官僚制的歷史形態加以對照，

讀者或可從中獲得某些啟發。至於納入〈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同時修改原《理性化與官僚化》書名，則不僅僅是擴大了詮釋韋伯核心思想的範疇，更可以為台灣目前頗欠缺「志業倫理」或「責任倫理」的現象提出針砭。

總之，韋伯出生於 1864 年，卒於 1920 年，距今可說快一個世紀了，但是他的思路如此地清晰、分析如此地犀利、看問題如此地精準，這樣的「百年智慧」值得一再咀嚼、反思，作為指引我們解決自身所處時代問題的重要標竿。我們經常聽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遠」，這句話應該可以適用在閱讀 Schluchter 教授的這本譯著上，畢竟汲取了思想巨人的智慧，讓我們對於「時代精神」（Zeitgeist）的變遷，以及人類未來命運的走向，能夠更為了然於心！

顧忠華

2013 年 5 月 21 日於思湧齋

目錄

本書引用之韋伯著作縮寫對照表／ v

序 顧忠華／ vii

理性化的矛盾／ 1

——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

- 一 由理性的「問題史」出發：理性主義的三種意含／ 1
- 二 拒斥現世的倫理—宗教形態：印度教及猶太—基督教傳統／ 16
- 三 支配現世的倫理—宗教形態：天主教及基督教／ 28
- 四 喀爾文教派與世界的解除魔咒／ 39
- 五 支配現世之理性主義的辯證發展：宗教與科學／ 45
- 六 現代人的命運與選擇／ 56

官僚制與民主／ 65

——韋伯論政治效率與政治自由之關係

- 一 韋伯 vs.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不同看法／ 65
- 二 官僚制的比較研究：現代職業官僚 vs. 中國家產官僚階層／ 90
- 三 德皇威廉二世時代的普魯士官僚制支配／ 110
- 四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官僚化問題／ 131

五 現代社會變遷下的官僚化未來：停滯或革新／145

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157

——韋伯論學術與政治之關係

一 韋伯兩篇演講的性格／157

二 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作為方法論及倫理的範疇／172

三 價值自由與責任倫理作為制度化的價值系統／193

四 韋伯模型的優點與侷限／209

附錄 I 關於韋伯〈中間考察〉一文的考證／219

附錄 II 韋伯兩篇演講發表的日期／227

附錄 III 韋伯著作的分期問題／235

理性化的矛盾¹

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

對世界之非理性的經驗……曾是宗教發展上的驅使動力。

——韋伯

一 由理性的「問題史」出發： 理性主義的三種意含

今日的社會學者們在評斷現代社會的「理性」時，有著

¹ 本文擬重建韋伯於其宗教社會學論文中對現代社會特質之分析，基於實際考慮，以下的討論僅限於世界圖像之構造及發展的層次。除了關於韋伯對現代的診斷外，本文尚嘗試探討韋伯本人對現代生活的評價態度，某種程度上也將觸及韋伯的「人生哲學」，設若他這方面的看法有超出個體之上的關聯性存在。本文對於韋伯著作之引用，亦完全以上述意旨為著眼點，主要的有《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序言，〈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世界各宗教之經濟倫理》中的〈導論〉及〈中間考察〉，《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某些部分，以及《經濟與社會》中宗教社會學的一章。

相當分歧的看法。茲舉兩例以說明：對帕深思（T. Parsons）而言，現代社會是歷來社會發展中最理性的一個體系。它擁有其他社會所無法達到的適應能力，這種適應力的基礎乃深植於現代社會的多面向性，亦即使進步的變遷所以可能的一種結構上的多元主義。隨著社會的變遷，個人的自由終究也會愈來愈增加²。相反地，對馬庫色（H. Marcuse）而言，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卻正是歷來所發展的社會形態中最不理性的。它擁有的是其他社會所無法獲致的操縱能力。這種操縱力的基礎乃在於現代社會的單面向性（one-dimensionality），使得進步的變遷力量持續地受到壓制。同時，這份強大的操縱力量也威脅到了本來便不多的自由，雖然這些自由是經過工業化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來的³。

這種對現狀極端不同的判斷，令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調和雙方的立場。這種立場即使有可能，我想它也無法消弭彼此的差異，而毋寧是站在承認差異這一端的。或許我們可以透

² 見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6 及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1971。帕深思談到適應能力的概念時，乃以社會作為基點，若換了其他的觀察角度，上述的判斷可能有所不同。帕深思的看法在其〈Christianity and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一文中亦有詳細的敘述，見 T.Parson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1967, pp. 385ff。

³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p. 3，馬庫色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全體主義性（Totalitarian）不只在政府形式、政黨統治的操作上，更在現代「多元的」政黨、新聞事業及各個「均衡勢力」中所蘊含的生產及分配系統上亦可看出。

過對整個問題之來龍去脈的觀察，即從一種「問題史」的角度出發，來闡明這種差異的由來。

就算帕深思及馬庫色的立場多麼南轅北轍，彼此不能相容，他們倆還是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即韋伯（Max Weber）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帕、馬兩人在對現代社會的過往和未來，以及對其理性的特徵下判斷時，都深受到韋伯的影響⁴。當然他們都不願意停留在韋伯的分析層次——一個想

⁴ 對帕深思而言，韋伯的影響乃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的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一書是「在韋伯的精神之下所寫的」（P. 2）。馬庫色利用他對韋伯的解釋來表達他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批判，見他於 Otto Stammer 所輯 *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 一書中的論文〈Industrialism and Capitalism〉，New York 1971, pp. 135-151，以及我在 *Aspekte bürokratischer Herrschaft* (Munich, 1971) 中對馬庫色的批評。有趣的是帕深思及馬庫色兩人在分析現代社會時似乎是從一個類似的角度來看問題。帕深思提到對他影響最大的知識傳統乃「從黑格爾經過馬克思到韋伯」的德國理想主義。馬庫色則在他著名的研究中溯及由黑格爾到馬克思的過渡。見 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1954)。指出此一類似之處，並非想掩蓋住他們倆在論點上及對韋伯評價上根本的差異。帕深思對韋伯著作能在美國廣為流傳的貢獻確是功不可沒，而我們也不能否定他對韋伯作品保持著——雖不是完全的——「忠誠」。見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Glencoe, 1937, pp. 500ff。帕深思的韋伯解釋在最近逐漸遭受批評，如 J. Cohen, L.H. Hazelrigg 及 W. Pope 在〈De-Parson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一文所顯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1975)。在此之前 Reinhard Bendix 也曾批評過帕深思對韋伯的解釋策略。見 R. Bendix and G. Roth,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 Berkeley, 1971, pp. 282-298。

要超越韋伯（帕深思），另一個則企圖回復到韋伯之前的心態（馬庫色）。我個人的看法則是：我們不妨在韋伯的立場上多逗留一會兒。因為韋伯的社會學不僅如所有的社會學說般，本身便屬於「現實問題的自我表達」⁵；他所看到的問題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問題。而且他的看法既不是系統理論，也不是新馬克思主義所能夠取代。韋伯綜合了他對資本主義——這一「近代西方的理性主義」——所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析，全面地檢視了一種情況，亦即西方經過長久以來的發展，直到近代方才「完成」的「世界解除魔咒」（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的過程⁶。他的分析同時觸及到現世秩序的理性化、人類對現世態度的知性化，以及這整個進展中隱含的種種矛盾。這些理性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不僅給現代社會帶來了所謂操縱控制上的問題，更產生了一個根本上的「意義」問題。

⁵ S. Landshut, *Kritik der Soziologie*, Neuwied, 1969, p. 41。

⁶ D. Henrich 曾經指出韋伯作品中的哲學意識及他對現代社會的科學分析之間的一致性（in O. Stammer op. cit, pp. 66-78）不僅是他的作品，就是韋伯本人的生平也常被視作診斷現代情況的例證。特別是 Karl Jaspers 對韋伯的形容：「那生來屬於荷馬及猶太先知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人』並未隨著尼采而消逝。他最後的偉大形象在韋伯身上重現——這一個代表了我們今天瞬息萬變之世界的人物。雖然韋伯周遭世界的特殊內涵消失得如此迅速，但永恆不變的是人類存在、認知以及其主要任務的（種種）基本問題。我們沒有任何偉大人物能用這種方式來肯定人類的自我認同了。韋伯是最後的一個。」見 K. Jaspers, *Max Weber: Deutsches Wesen in politischen Denken*, Odenburg, 1932。

許多學者已一再強調，以理性主義或理性化的問題作為整體觀察韋伯立場的重心，乃是最恰當的⁷。然而，這必須以概念的明確化作為前提。諸如「理性主義」或「理性化」的概念在韋伯的用法中一直是不怎麼確切的。在此，我建議劃分清楚理性主義的三種意含⁸：

首先，理性主義意指一種透過計算來支配事物的能力。這種理性主義乃是經驗知識及技能的成果，可說是廣義的科

⁷ C. Seyfarth 曾在討論韋伯對基督新教倫理的研究時指出：「唯有將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個題目重新在理性化的概念架構中予以擴充及精確化。對韋伯的討論方才有所建設性，而非只是抄錄引用和反覆辯論。」見 C. Seyfarth 及 W. M. Sprondel 所輯 *Seminar: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Frankfurt, 1973, p. 342。以理性化來作為闡釋韋伯作品的中心概念在二〇年代已經開始，見 S. Landshut, op. cit. 這種評論不僅基於重新承認韋伯作品中方法論及歷史研究間的連繫，而且圍繞在韋伯與馬克思的主題對比上。請參閱 Karl Löwith: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London, 1982。近來 Jürgen Habermas, Wolfgang J. Mommsen 及 G. Abramowski 等人亦有作品論及。R. Bendix 則認為，理性化的概念很適合作為整體觀察韋伯思想與著作的出發點，只不過我們必須體認到韋伯本人對理性化過程的多重意義性及未確定性之描述。R. Bendix, "Max Weber's Sociology Today",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7, 1965, pp. 9-22。

⁸ 對理性主義概念的多重意義性請參考 Max Weber, RS I, p. 265 及 Ann Swidler,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Sociological Inquiry* 43, 1973, pp. 35ff., B. J. Weiss, *Max Webers Grundlegung der Soziologie*, Munich, 1975。此處所做的分類乃作者本人之建議。